

中国和世界

历史中的重庆 *Chongqing in Historical China and World*

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

Selected Papers on Chongqing Histo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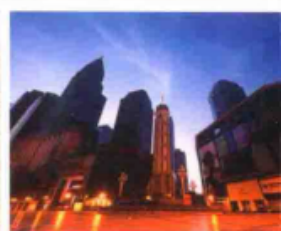
主编 / 王 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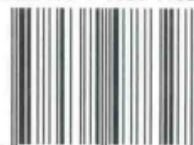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ZHONGGUO HE SHIJIE LISHI ZHONG DE CHONGQING



ISBN 978-7-5624-7732-7



9 787562 477327 >

定价：68.00元

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庆

——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

主 编 王 希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庆: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

王希主编.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3.9

ISBN 978-7-5624-7732-7

I. ①中… II. ①王… III. ①重庆市—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7.1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216771 号

中国和世界历史中的重庆

——重庆史研究论文选编

主 编 王 希

策划编辑:雷少波 邹 荣

责任编辑:杨 敬 关德强 版式设计:雷少波

责任校对:陈 力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26.5 字数:594千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2013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7732-7 定价:68.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前言

◎ 王 希

重庆是西南重镇,历史丰富悠久,文化多元独特,曾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扮演过重要的角色。南宋末期,重庆曾是抵御蒙古铁骑的最后防线。鸦片战争之后,英国凭借不平等条约,沿长江入侵内陆,重庆开埠,成为通商口岸,从此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民国初期,重庆成为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发源地之一。抗战期间,重庆是中华民国的战时首都和陪都,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所在地,在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亦见证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东方堡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重庆作为直辖市,曾引领西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发展。在“三线建设”时期,重庆作为工业重镇,对西南地区的工业化进程贡献巨大。“文化大革命”时期,重庆首当其冲,成为全国的“重灾区”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重庆发挥自身的传统优势,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在西部开发和内陆城市更新方面作出了有创意的改革尝试,丰富了当代中国改革的历史经验。

尽管重庆历史悠久,但严格学术意义上的重庆史研究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才开始起步。在过去 30 多年里,国内学者(尤其是四川和重庆学者)从历史地理、考古学、地方史、区域史、文化史、抗战史、中国革命史等角度入手,探讨重庆历史的不同阶段和不同侧面,取得了重要的成果,也培养出一支精干的研究队伍。但与国内同类城市的研究相比,重庆史研究在规模和深度上仍有较大的差距,成果的影响力也相对有限。限于人力、资料和资源等因素,研究时段和专题覆盖极不平衡,断代史研究以民国时期为重,成果最为丰富,古代史和明清史的研究相对薄弱,1949 年后的重庆史研究则刚刚起步。

20 世纪末,随着改革开放的重心逐渐西移,重庆作为西南地区历史最为悠久、规模最大的工业和商业城市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1997 年再度成为直辖市之后,重庆的经济发展更上一个台阶,重庆史研究也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重庆学界与国内外学界积极合作,开启了“抗战大后方文化”等大规模的研究项目。在重庆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历时 12 年的三卷本《重庆通史》完成并出版,填补了重庆史研究学术史上的重大空白,还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1] 国际学术

[1] 周勇(主编):《重庆通史》(3 卷本),重庆:重庆出版社,2002 年;章开沅、周勇(主编):“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丛书”,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 年起出版。

界也在重新“发现”重庆历史,一批从区域史、体制史、妇女史、劳工史角度切入的专著脱颖而出,弥补了英语世界没有重庆史研究专著的空白。〔1〕

新的时代要求史学家重新思考和认识重庆历史。事实上,重庆所处的地理位置、它的特殊历史经历和它在中国和世界历史上曾扮演的特殊角色赋予了重庆历史一种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也为全球化时代的重庆史研究注入了一种强大的内在动力,促使重庆史的研究者们思考一系列的新问题,包括内陆城市发展和演变的动力、传统与现代性在内陆城市的冲突与交融、长江流域不同地段的移民运动与移民文化、近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制在内陆城市的传承与变革、区域与中央的关系、西南和重庆区域内的族群关系、中国内陆与全球化的关系、区域文化特性与民族政治共性之间的博弈等。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开辟新的重庆史研究,成为重庆史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背景,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史学研究中心在2011年底提出建议,在重庆召开一次国际会议,邀请国内外重庆史研究学者参加,一起来做三件事:①梳理重庆史研究的学术成果;②展示和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③结合史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重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我们也希望通过会议组建一个重庆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为开创广义上的“重庆研究”奠定基础。我们感到,在全球化时代,地方史的研究必须纳入到国家史和世界史的视野之内,否则我们无法准确和深入地认识重庆史、中国内陆的历史,乃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史。

我们的提议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积极响应。“重庆史研究国际研讨会”于2012年6月4—6日在重庆大学高研院文字斋举行。来自国内外的50多位历史学者和档案文献专家参加了会议,一共提交了近40篇论文。在短短两天的时间内,与会学者紧锣密鼓地进行了6场小组讨论会和一次圆桌讨论,针对上述主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对话与交流。〔2〕本文集发表的论文均选自这次研讨会。

从会议组织者的角度来看,我觉得,2012年研讨会会有几个明显的特点。第一,会议研讨主题覆盖的时段比较长,包括了古代重庆史、近代重庆史、民国重庆史、抗战重庆史和当代重庆史。这样的安排不光是为了展示重庆历史的长期性、丰富性和复杂性,更是希望提供一个宏观视野,促使研究者思考、观察和比较不同时段的重庆史的特征与相关性。第二,研讨会将“重庆史研究”本身作为一个讨论主题,集中地梳理了这个领域的研究成果,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相关的理论问题。用周勇教授的话来说,这种“以重庆史研究本身为对象的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史研究的学术史上是第一次。〔3〕第三,参会学者的背景非常多元化。参会学者中有在本领域内耕耘多年的资深学者,也有正在进入的新生力量;有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也有在公共领域(如博物馆、展览馆、档案馆、城市规划部门、移民会馆等)工作的历史学者;有来自重庆本地的学者,也有来自国内其他院校的学者,还有来自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美国等地的学者以及旅美中国学者。不同背景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贡献了对重庆史研究的思考,共同营造了一种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的研究氛围。

研讨会的成果主要通过会议论文反映出来,并经修订后编辑出版,我们希望通

〔1〕 关于重庆史研究的英文著述的详细介绍,见本书,卢汉超:《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范畴》,附录。

〔2〕 关于研讨会的日程,参见本书附录。

〔3〕 周勇:《重庆史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新形势下重庆史研究的方向与条件》。

过这种方式与更大范围的读者分享。我不是研究重庆史的专家,不敢班门弄斧,随意评论各位学者的研究,就个人阅读的感想而言,我觉得这次会议以及这部文集展示了以下三方面的学术意义:一是开启了对重庆史研究的理论和体系问题的思考;二是通过梳理既成研究的成果重新审视了重庆史研究的史料与方法;三是给我们带来了如何在重庆史研究领域进行创新的启发。

重庆史研究虽然已有 30 多年的学术史,但仍然是一个年轻的领域,尚无成熟的理论或体系,但在这次会议上,多位学者开始对重庆史研究的理论和体系进行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研讨会的开幕致辞中,周勇教授率先提出了一个重庆史的研究框架,即“以古代、近代、当代历史为纵坐标,以政治、经济、文化史为横坐标”,观察两者在不同历史阶段中的核心内容以及交错与互动,从而获得对重庆史发展的总体认知。他提出的另外一个(在我看来,也是更重要的)思考则是,重庆史研究不应该只是作为一种地方史的研究,而应该将其作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部分来研究,因为历史上的重庆曾多次被“推上国家历史或国际历史发展的重要舞台”,扮演过历史的主角,^[1]而且这些历史的角色对中国史和世界史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换言之,研究重庆史,眼光要放宽,要从重庆看世界,从世界看重庆。我的理解是,周勇教授所指的不光是要将在重庆发生的对中国和世界历史发展有重要联系的事件纳入重庆史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且要学会从中国史和世界史的角度来观察作为地方史的重庆史。

无独有偶,这种思路得到研讨会好几篇论文的呼应,至少是在构思方面是不谋而合的。譬如,包安康教授的论文讨论的是抗战时期(尤其是日军轰炸重庆期间)国际舆论对重庆的新闻报道以及美国社会的反应。他的核心论点之一是强调重庆人民在面对日军轰炸时表现出来的顽强形象通过西方媒体的传递给西方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他为什么直接使用“重庆代表中国”作为论文的题目。^[2]敖依昌教授讨论的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重庆与世界的关系,不过他关注的是位于重庆的国民政府如何与英美俄等国建立起亚太国际合作机制的过程。在他看来,这一段历史经历对于 21 世纪的国际政治仍然有可资借鉴的现实意义。^[3]我们也可以从卞历南教授的研究中获得类似的启发。卞教授以抗战时期的重庆大渡口钢厂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讨论国民政府行政体制——尤其是“单位”体制的建设过程,但他力图勾画的却是“单位”的概念和制度跨越太平洋从美国来到中国的路径。他还暗示我们,这种体制也跨越了 1949 年的历史分界线进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也就是说,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大渡口钢铁厂的试验是延续至今的中国国家行政管理历史的一部分。^[4]如果沿用广义的标准,我们还可以从研讨会论文中找出其他例子。但我想说的是,周勇教授提出的将重庆史做为中国史和世界史的一部分的思考实际上是为许多同行所认同的。

对于理论和体系问题,谢放教授选择了另外一个思考的角度。他从概念入手,首先提出要将“重庆城市史”与“重庆地方史”这两种概念区分开来,前者的研究应

[1] 周勇:《重庆史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新形势下重庆史研究的方向与条件》。

[2] 包安康:《重庆代表中国:陪都与 1939—1945 年中国的世界形象》。

[3] 敖依昌:《抗战陪都与亚太国际合作》。

[4] 卞历南:《“单位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释中国单位制度之起源》。

该是“以城市的结构和功能的演变”为主要内容,而不是只研究“重庆地区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我认为,谢放教授提出了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即城市的定义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重庆史研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在过去一个世纪内至少有数个在地理空间、行政区域和文化内涵上不同的“重庆”存在过。直到现在,重庆的身份也至少是双重的,它既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就人口和地理面积而言),也是中国最大的乡村。重庆如果是一座城市的话,它的外延与内涵在哪里,是什么,研究者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共识,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谢放教授强调要将地域范围、城乡关系和市政研究三者作为重庆史研究的主要原因。对于重庆史的研究框架,谢放教授提出,应以探讨四种结构——空间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为主要内容,并以此为指导来写作城市通史和专题史。〔1〕

同样,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至少有2~3篇是采用了谢放教授的思路。譬如,胡道修先生对重庆辖区内的奉节(夔州)从古到今作为城镇主体地位兴衰的研究,就是从区域地理系统的角度出发,考察地理要素(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对其城市形态、结构和功能变迁所产生的影响。他提出地形地貌、区域位置(包括军事)以及由此衍生的经济环境对城市的兴衰有直接的影响。胡道修先生也间接提及重庆的地理和行政界定的问题,指出目前的作为“省级架构的直辖市”的重庆区域内拥有数十个大小城市,各地的地域环境和地理要素差异甚大,城市空间和城市形态也迥然不同。由此看来,将“重庆城市史”与“重庆地方史”区分开来显得更加必要。〔2〕另外一篇相关的论文为张凤琦教授所做。她讨论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三线建设”及其对重庆城市现代化的影响。在张教授看来,“三线建设”是国家出于全国经济和军事利益的考虑做出的重要战略决定,但这项决定的直接结果是赋予重庆城市一种新的工业经济的结构,并改变了城市及周边地区的空间结构和社会结构。〔3〕这在某种意义上与胡道修先生对奉节的研究形成有意思的对比。邓晓教授的论文同样是讨论“三线建设”给重庆城市发展带来的冲击和影响,但他更关注随“三线建设”而来的现代移民问题以及“外地人”与重庆本土居民之间的文化冲撞与交融。〔4〕

卢汉超教授没有直接加入对重庆史研究的理论问题的讨论,但他带给与会学者另外一种思考。他在论文中勾画了城市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起源和发展轨迹,介绍了当代西方城市史学的五种主要的研究范畴(或范式)——城市传记、新城市研究、城市文化、城郊史研究、城市史专题研究——并列举了每种范式中的经典或代表性著作。从卢教授提供的这个国际背景中,我们从中可以领悟到中外城市史研究在问题意识、研究思路和研究手段上的异同。卢教授提到的另外两个事实也很有意义:一是西方城市史学成为学界认可的专门领域不过半个世纪;二是城市史研究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跨学科、多学科交叉的学问。他同时提到,西方城市史研究面临的两个

〔1〕 谢放:《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材料》。

〔2〕 胡道修、胡黎妮:《地理要素与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演变——以夔州(奉节)为例》。

〔3〕 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

〔4〕 邓晓:《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移民文化》。

基本问题与重庆史研究面临的问题十分相似:城市的定义和城乡关系。^[1] 这些提示对于我们来说是很有帮助的。我觉得,更有帮助的是卢教授为我们整理的西方学界对中国城市史研究成果的详细书目(附在他的论文之后),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学界对中国城市史的研究十分发达,总共出版了上百部的专著,其中关于上海史的研究最多,光英文出版的专著就有 50 多种,而关于重庆史的专门研究只有 6 种,且多集中在民国和抗战时期。^[2] 我相信,这些研究成果可以帮助打开我们的思路,从比较的角度认识到沿海城市与内陆城市的发展轨迹,寻找共性与个性。^[3]

薛新力教授也谈到了重庆史研究的框架问题。他对 1980 年以来重庆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做了仔细的梳理,但发现该领域存在着严重的“基本理论概念的模糊”等问题,这种认识上的模糊导致了研究上的误区,造成了“巴渝文化”和“三峡文化”等概念的混淆,即便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人将“巴渝文化”等同于重庆文化(甚至重庆直辖市文化)。他认为,“巴渝文化”和“重庆文化”虽然都是地域文化,在内容上有交叉,但前者是历史地域文化,后者是行政地域文化,两者是有区别的。他从文化史的角度提出一种“三圈理论”,即将重庆文化区划分成为核心文化圈、交叉文化圈和辐射影响圈,作为研究重庆历史文化的地理框架。^[4] 薛教授在这里提出的问题仍然是重庆的定义问题。虽然与会学者对理论和体系问题并没有定论,这种讨论无疑是极有意义的。

我将对既成研究成果的梳理和对史料与方法的讨论看成此次研讨会重要的成果是有道理的,因为对史学史的梳理和评价是未来研究的起点,而且梳理和评价也是一个领域的自我反省、总结经验教训、探索规律和范式的过程。

在史学史方面,周勇教授介绍了抗战大后方的文化研究,谢放教授讨论了重庆通史和专题史的写作,薛新力梳理了 1980—2010 年间重庆文化史的研究成果,胡大牛教授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党史的研究情况,何蜀先生介绍了重庆文革史的研究历史与现状,来自台湾的张力教授介绍了台湾的重庆研究。通过这些介绍和讨论,我们看到,既成研究的最重要成果大多集中在近现代重庆史,尤以民国和抗战时代为重。我们同时也看到,重庆史研究的发展也受到政治和经济因素的影响。周勇教授在介绍“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项目时,曾说当前是“研究重庆史最好的时候”,不光是因为政治上的禁区被打破,而且支持研究的经费状况也大为改善。^[5] 但从整个领域来看,问题还是不少。薛新力就指出,重庆文化史的研究大多存在着研究方法单一和多学科知识不足等问题,影响了研究的质量和层次。在地方党史研究领域内,胡大牛也指出,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党史研究处于“会议史学”的状态,重复的多,创新的少。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党史研究的范围和内涵有所扩大,但总体来说,研究质量仍然受到资料和政治环境的影响。^[6] 重庆文革史的研究则更为极端,用何蜀先生的话来说,“参与者极少,成果极少”,所以他在会议上宣读的史学史论

[1] 卢汉超:《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范畴》。

[2] 卢汉超:《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范畴》,附录。

[3] 受 2012 年研讨会的启示,重庆大学高研院史学研究中心将于 2013 年 11 月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史研究中心在重庆大学共同举办“城市史研究的新疆域:内陆与沿海城市的比较研究”国际研讨会。

[4] 薛新力:《近三十年来的重庆文化研究》。

[5] 周勇:《重庆史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新形势下重庆史研究的方向与条件》。

[6] 胡大牛:《改革以来的中共重庆地方史研究简述》。

文基本是他个人研究成果的总结。但他也提到,有关方面也意识到这段历史的重要性,重庆市政协和重庆市图书馆已从2011年开始了抢救重庆“文化大革命”口述史的工作。^[1]我记得会上还有学者提到研究重庆史的人力资源和后续力量的问题。据我的了解,目前活跃在重庆史领域的前沿学者和资深学者有许多人是20世纪80年代从四川大学、西南大学等高校毕业的历史系学生。他们承担起了创建重庆史研究的开拓性工作。但是,他们的继任者在何方,谁来继承重庆史研究的事业,这是一个十分困难但又不能回避的问题。重庆本地或四川的高等院校应该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吗?这些问题涉及历史教学的问题。我知道,在美国的一些州内,地方史(即本州的历史)是州立大学历史系必开的科目。

与会学者对于史料的热烈讨论超出我的预料之外。在会上,精通重庆档案的唐润明先生对重庆档案馆的清代档案、民国档案、革命历史档案和新中国成立后档案作了介绍,他尤其谈到陪都档案。在传统的档案管理制度下,地方档案的建设和管理时常受到上级档案部门的控制,所以原本许多存于重庆档案馆的材料被转移到其他档案馆保存,对当地学者研究重庆史造成了极大的不便。但重庆档案馆仍然保留大量十分有价值的档案,包括1949年初西南地区的档案,如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的原始文献和西南各省市综合情况资料以及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等。^[2]张力教授对台湾的重庆研究的档案和典籍介绍也引起了极大的兴趣。如卢汉超教授一样,他也为与会学者整理了一份我国台湾地区的重庆研究的成果目录和与重庆史相关的档案材料明细表,其中的档案多为政府部门关于重庆和四川的工业、商业和教育领域的大量资料,分别存于“中研院”近史所、档案管理局、“国史馆”等单位。张力提到,在史料保存与开放使用方面,台湾地区有自己的优势,尤其是1950年以前“中央”政府层级的档案数量巨大,1949年去台人士也留下了诸多关于重庆的记忆文字,如这些史料能“与重庆各级档案馆典藏的档案配合应用,可以开发或深化更多研究课题”。他说,目前的台湾史学研究注重本土历史研究,内地学者也许可以大量利用这些档案。^[3]

陈廷湘教授对史料的讨论集中在西南地区(包括重庆)的民国县级档案。他指出,西南地区因在八年抗战时期未曾受到日本侵华战火的直接破坏,“历史档案未受损毁,保存相当完好”。在他看来,西南地方的民国档案(尤其是县级档案)从数量上讲是全国和世界首屈一指的,从质量上讲“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资料宝库”,为此西南地区历史学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发掘、保护和使用这些档案。他还提出,为了对这些档案进行长期保存和方便研究者的便捷使用,应该立即对四川和重庆县级档案馆馆藏的民国档案进行数字化处理。^[4]在电子化手段如此发达的时代,做到这一点,技术上应该不是问题,但如何获得这些史料,如何获得必要的人力和财政支持,则是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

在设计本次研讨会议程时,我们对论文的质量抱有很大的期望,但并没有确定

[1] 何蜀:《重庆“文革”史的研究及相关思考》(何蜀先生的论文因故未能在本文集中刊登,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致信重庆大学高研院历史研究中心索取)。

[2] 唐润明:《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利用》。重庆市图书馆的王志昆先生也在会上介绍了重庆市图书馆的馆藏,尤其是1949年之前的书籍和报纸。他并告知,该馆已经完成对民国时代出版物的电子数据化的处理。

[3] 张力:《台湾的重庆研究:档案典藏与研究成果的介绍》。

[4] 陈廷湘、李瑞:《西南地区民国时期专署和县级档案搜集整理研究的意义》。

的把握,只是在读完所有论文之后,我们才感到有相当一批文章在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上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研讨会上,每一场小组的讨论都是高潮迭起,争论不断,我相信,与会学者也都有同感。

在难度较大的古代重庆史的三篇论文中,除了前面提到的胡道修先生从地理要素角度出发对奉节城的变迁进行研究之外,蓝勇教授和张文教授的论文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蓝勇教授对重庆佛图关名实和地理位置作了详尽考察,不仅参考了大量中外典籍书目和图像资料,而且还使用了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和实地考察等方法,多方求证,推进了对这一历史疑难问题的研究。张文教授尝试将经济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围绕宋代夔路的盐业资源,来观察由此引发的人口变动、族群博弈、行政建制和官民互动等多种运动,并指出政府盐业政策的调整是调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种手段。这种构思的研究无疑包含了深刻的现实含义。〔1〕

近代重庆史研究的四篇论文中有三篇都把目光聚焦在基层社会的“秩序”建构之上。其中周琳和戴史翠关注的是清代重庆的商业和法律秩序,主题相近,使用的基本原始材料都是巴县档案。周琳重点考察乾隆至道光年间的“官牙制”对重庆商业市场的影响,以及“官牙制”如何演变成为一种利益交换和利益分配机制,揭示了隐藏在法律条文背后的官府控制牙行、牙行监管商人的实际市场秩序。〔2〕戴史翠讨论的是晚清时代重庆地方法庭如何采用协商与强制并行的手段,调动民间和市场资源,来建构一种解决民间商业纠纷的“秩序”,在保持国家权威的同时,维护商业契约的自治性,从而展现了清朝司法系统的多样性和灵活性。〔3〕应该指出的是,这两篇论文都是基于已经完成和正在写作的博士论文之上,两人分别在中美两国高校接受博士训练,思考问题的方向和深度相近,令我们感到吃惊和敬畏,也隐约感到重庆史研究会后继有人。岳精柱先生可以说是一位公共历史学家,他非常独到地选取了重庆八大移民会馆为研究对象,同样使用了巴县档案,考察会馆如何构建移民认同、与政府打交道、并通过参与城市管理以换取政府的保护的过程。与周琳和戴史翠的研究一样,他的研究也涉及底层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官民互动。三人对秩序构建过程“互动”和“博弈”(后者也是张文的研究所强调的内容)的重视,帮助我们认识其中的复杂性。

还有一组文章,本身可能并不相关,但在“问题意识”上有某种相近之处,那就是,它们都关注制度的建立和统一——或许牵强一点地说,关注“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问题。这些文章包括马强教授关于明清时代川渝地区洪水灾害与救济体制的讨论,〔4〕邓晓教授和张凤琦教授关于“三线建设”的讨论,〔5〕蔡斐先生关于1949年后重庆传播系统的历史似乎也勉强可以纳入这个范围。〔6〕然而,比较直接和翔实的讨论则是表现在张守广、黄虹和卞历南三位教授的研究之中。张教授讨论的是1935—1937年间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对川军进行整编并纳入国家军队过程,他重点考察作为著名实业家和四川建设厅厅长的卢作孚如何利用多重身份,在日本人

〔1〕 张文、裴一璞:《资源博弈与结构互动:宋代夔路盐业资源与区域社会变迁》。

〔2〕 周琳:《隐藏在条文背后的“秩序”——从中介贸易纠纷看清代中期重庆的“官牙制”》。

〔3〕 戴史翠:《帝国、知县、商人,以及连系彼此的纽带:清重庆的商业诉讼》。

〔4〕 马强、高岩、杨霄:《明清时期川渝地区洪水灾害与社会救济》。

〔5〕 邓晓:《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移民文化》;张凤琦:《论“三线建设”与当代重庆城市现代化》。

〔6〕 蔡斐:《重庆新闻传播体系的历史演变(1949—2012)》。

侵中国的危机形势下,游说各方,化解矛盾,最终促成整编成功,为国民政府入川治川铺平了道路。^[1] 黄教授关注的是抗战时期重庆传染病的防治与重庆史现代防疫体系的建立。她利用重庆档案馆的陪都档案,考察了重庆在从普通内陆城市一跃成为中国战时首都的过程中,城市的卫生和医疗条件发生变化的经历和公共卫生体制的诞生。这在西方学界也是一个热门题目。她的结论是,抗战的环境、陪都的地位和大量外来知识人口的进入,为重庆的传染病防治打下了基础,但战争的结束中断了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势头。^[2] 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卞历南教授的论文,这里想强调的是他研究的是抗战时期的体制建设(“单位”体制的起源)和“国家建构者”(甘乃光)。^[3] 他讲的故事实际上有多重含义:一方面讲“单位”的起源,另一方面讲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与大渡口钢铁厂行政体制的关系,第三个方面讲述甘乃光个人的故事。他的论文也是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研究的一个典范。这个领域在西方学界已经盛行20年左右,西方学者多集中在作跨大西洋的研究,跨太平洋研究才刚刚起步。

还有两篇论文分别以女性的“政治化”(politicization)和记忆“社会性别化”(engendering of memory)为出发点,讨论抗战重庆的历史。何稼书教授是“重庆通”,发表过关于重庆劳工运动的英文专著,这次提交的论文是即将在英文学术期刊*China Quarterly*上发表的新作。他也试图做一种方法上的创新,将劳工史、妇女史和中国革命史结合起来,讨论抗战时期重庆纱厂的女工们如何在妇女指导委员会的组织和支持下,组织起来,参与争取经济利益和捍卫人生尊严的斗争。这个讲述普通的农村女孩们如何变成工业无产阶级的一部分的故事今天似乎已经从国内的史学叙事中消失了,但何稼书却认为这是重庆历史的重要篇章。他要揭示的是女工如何通过和资方和各种社会偏见的斗争,变成了自为的、拥有政治意识的公民。^[4] 同样出版过研究重庆史的英文专著的李丹柯教授关注的是战争记忆中的社会性别问题。这个思路在美国学界也是一个前沿问题。她借助“看得见”的图像资料作为研究材料,以2010年重庆图书馆举行的抗战漫画纪念展为起点,讨论传统的抗战漫画中的男性形象如何主导了人们对战争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如何呈现了一种并不完全真实的历史。李教授发掘出表现女性抗战的漫画作品和当时女性漫画家的作品,来呈现另外一种抗战记忆。^[5] 与何教授一样,李教授的动机是要让那些被传统史学“消声”(silence)的普通人发出声音。她呼吁,要跳出传统的研究思路的局限,关注非传统的史料。

关于重庆史研究未来的发展方向,与会学者在开幕致辞、小组讨论和圆桌会议中多有提及,还有一些学者在会后的反馈中也有专门的讨论和建议。总结而言,大概有这样一些看法,记录在此,以抛砖引玉。

第一,要对“重庆”的概念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区分作为历史沿革、地理空间、行政区域和文化影响意义上的“重庆”,并对每一种意义上的“重庆”做系统的梳理,并勾画它们之间的交错关系。有了对作为城市的“重庆”和作为地方或区域的“重庆”

[1] 张守广:《卢作孚与川康整军》。

[2] 黄虹:《试论抗战时期重庆传染病的防治》。

[3] 卞历南:《“单位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释中国单位制度之起源》。

[4] 何稼书:《战时女工的政治化:抗战时期重庆纱厂的劳工研究》。

[5] 李丹柯:《社会性别,战争,与看得见的抗战记忆》。

的认识之后,重庆史的研究能够有比较清楚的定位,专题研究也比较有效。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考虑谢放和薛新力教授的建议,使用“重庆城市”与“重庆地域”或“重庆核心圈”与“重庆辐射圈”这样的思路。

第二,在研究上,需要有大量扎实的专题研究作为基础,在每一个重要的分支领域中——包括地域范围、行政建制、人口构成、经济功能、文化沿革、空间格局和政治变迁在内,都要有系统的研究,并要关注不同领域的交错影响。在专题研究中,还需要关注重庆城市和地方的“特殊性”和“个性”,探讨这种“特殊性”和“个性”在重庆历史中的反映及其对重庆史形成和演变的影响。譬如,在讨论作为移民城市的重庆的历史时,考虑古代重庆的移民运动与近现代重庆的移民运动之间异同,并考虑重庆的移民运动与其他城市(沿海和内陆)的移民运动的异同何在等。

第三,需要考虑在一种在更大、更复杂历史背景之下的重庆史研究,要将重庆史与西南区域史、中国西部史、四川省历史、长江流域的历史、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起来,还有与中国的军事史、工业发展史、政治史、社会运动史、内陆移民史等结合起来;在讨论重庆与外部世界的交往时,注重这个过程当中的“博弈”过程,而不是单向的、一边倒的交流。

第四,注重在对精英和对大众历史的研究中寻求平衡,这不光是针对政治史而言,也是针对经济史、文化史和社会史而言。

第五,历史研究是一门昂贵的学问,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人力和智力,历史学家无法做到对所有研究题目都一视同仁地对待,但我们可以在对获得资助的重大课题进行研究的同时,利用机会,循序渐进地推动对其他相关课题的覆盖。

第六,在资料建设方面,要充分利用现有的电子手段,建立重庆史资料数据库,搜集、整理、储藏有关重庆历史的所有资料,这是重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异常艰巨,但功德无量。^[1]

除此之外,此次研讨会也促进我们思考其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重庆史研究如何更直接、更全面地与国际学术界接轨(这一点在周勇教授的论文中有比较详细的叙述),二是如何将重庆史研究与“公共史学”结合起来,使其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结束本文之时,请允许我向与会学者的参与和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对重庆大学高研院(尤其是张旭东院长)对此研讨会的召开和文集的出版所给予的有力支持表示感谢。张瑾教授和郭畑博士是本次研讨会筹备组的成员,在学者邀请、议程设计等方面作了大量的贡献;高研院行政办公室的各位同仁为研讨会的顺利举行提供了一流水平的行政支持;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大学校方和重庆市历史学会也对会议的召开给予了有力的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2013年7月14日

[1] 在研讨会上,重庆市沙坪坝区地方志办公室的张建中先生做了“地方志与重庆文化区”的发言,介绍了对地方史料的搜集,尤其提到他们最近搜集到的一位公社干部的长达40年的日记。由此看出,地方志办公室可以在史料搜集和基层历史研究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 录

前 言 / 王希	I
----------------	---

重庆史研究——理论、方法、材料与成果回顾

重庆史是中国史,也是世界史——新形势下重庆史研究的方向与条件 / 周勇	2
西方城市史研究的范畴 / 卢汉超	16
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材料 / 谢放	34
近三十年来的重庆文化研究 / 薛新力	42
台湾的重庆研究:档案典藏与研究成果的介绍 / 张力	61
西南地区民国时期专署和县级档案收集整理研究的意义 / 陈廷湘 李瑞	83
重庆市档案馆馆藏档案及其利用 / 唐润明	91

专题研究(1)——古代重庆史

重庆佛图关名实及地理定位研究 / 蓝勇	108
地理要素与城市形态和空间结构的演变——以夔州(奉节)为例 / 胡道修 胡黎妮	122
资源博弈与结构互动:宋代夔路盐业资源与区域社会变迁 / 张文 裴一璞 ..	132

专题研究(2)——近代重庆史

隐藏在条文背后的“秩序”——从中介贸易纠纷看清代中期重庆的“官牙制” / 周琳	142
帝国、知县、商人以及联系彼此的纽带:清代重庆的商业诉讼 / 戴史翠	166
明清时期川渝地区洪水灾害与社会救济 / 马强 高岩 杨霄	181
清代移民会馆与重庆民间社会秩序的构建 / 岳精柱 邹绍清	190

专题研究(3)——民国重庆史

“单位是怎样炼成的”:重新解释中国单位制度之起源 / 卞历南	214
--------------------------------------	-----

战时女工的政治化:抗战时期重庆纱厂的劳工研究 / 何稼书	237
卢作孚与川康整军 / 张守广	268

专题研究(4)——抗战重庆史

社会性别,战争与看得见的抗战记忆 / 李丹柯	284
试论抗战时期重庆传染病的防治 / 黄虹	299
重庆代表中国——陪都与 1939—1945 年中国的世界形象 / 包安廉	315
抗战陪都与亚太国际合作 / 敖依昌	326

专题研究(5)——当代重庆史

改革以来的中国共产党重庆地方史研究简述 / 胡大牛	340
论“三线建设”与重庆城市的现代化 / 张凤琦	353
重庆的“三线建设”及其移民文化 / 邓晓	365
重庆新闻传播体系的演进(1949—2012 年) / 蔡斐	378

附录	387
----------	-----

附录 1 2012 年重庆史研究国际研讨会议程	387
-------------------------------	-----

附录 2 研讨会学者合影	392
--------------------	-----

索引	393
----------	-----

作者简介	400
------------	-----

英文目录

Preface / WangXi	I
------------------------	---

The Study of Chongqing History—Theories, Approaches, Materials and Historiography

The History of Chongqing Is Part of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World—Directions and Conditions for the Study of Chongqing History in a New Era / Zhou Yong	2
Concepts of Urban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West / Lu Hanchao	16
Theories, Approaches and Materials in the Modern Studies of Chongqing History / Xie Fang	34
A Historiographic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the Culture of Chongqing in the Past Three Decades / Xue Xinli	42
Chongqing Studies in Taiwan: An Introduction of Archives and Scholarly Works / Chang Li	61
The Significance of Collecting, Organizing and Studying Southwestern Region's Prefecture-and County-Level Archives of the Republican Era / Chen Tingxiang and Li Rui	83
The Collections and Use of the Chongqing Municipal Archives / Tang Runming	91

Themes in Chongqing History (1)—Ancient Chongqing

A Study of Fo Tu Guan, Its Name and Its Geographic Location / Lan Yong	108
Geographic and Natural Components and the Evolution of Urban Pattern and Urban Spatial Structure—A Case Study of Kuizhou (Fengjie) / Hu Daoxiu and Hu Lini	122
Resources Negotiation and Structural Interactions: Salt Resources in Kuizhou and Regional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Song China / Zhang Wen and Pei Yipu	132

Themes in Chongqing History (2)—Premodern Chongqing

Market “Order” Embedded in the Legal Text: An Examination of the “Government-Approved Trade Broker System” in Mid-Qing Chongqing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ases Involving Trade Brokering / Zhou Lin	142
Empire, Magistrates, Merchants, and the Ties that Bind: Commercial Litig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ongqing / Maura Dykstra	166
Flood Disasters and Social Reliefs in Sichuan and Chongqing during the Ming-Qing Era / Ma Qiang Gao Yan and Yang Xiao	181
Immigrant Associations and the Forging of Chongqing’s Non-governmental Social Order during the Qing Era / Yue Jingzhu and Zou Shaoqing	190

Themes in Chongqing History (3)—Republican Chongqing

How Was <i>Danwei</i> Created? A Reinterpretation of the Origins of China’s <i>Danwei</i> System / Morris L. Bian	214
The Politicization of Women Workers at War: Labor in Chongqing’s Cotton Mills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Joshua Howard	237
Lu Zuofu and the Military Reorganization in Sichuan in the 1930s / Zhang Shouguang	268

Themes in Chongqing History (4)—Chongqing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Gender, War and the Visible Memories of Wartime / Li Danke	284
Chongqing’s Epidemic Preven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Huang Hong	299
When Chongqing Was China: The Wartime Capital and China’s Global Image 1939—1945 / Alan Baumlér	315
Chongqing and the Asia-Pacific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 Ao Yichang	326

Themes in Chongqing History (5)—Chongqing since 1949

A Brief Review of the Study of CCP History in Chongqing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Opening-up / Hu Daniu	340
The “Third-front Construction” and the Urban Modernization of Contemporary Chongqing / Zhang Fengqi	353
The “Third-front Construction” and the Immigrant Culture in Chongqing / Deng Xiao	365
The Evolu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ongqing’s News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1949—2012 / Cai Fei	378